



普通高等教育“十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

# 中国古文献学

孙钦善 撰

出... 波提舍既是傳出故... 為法無力不能... 宋武公生仲子...

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

杜氏註

傳惠公元妃孟子卒

宋元妃明始適... 惠公名... 卒不稱薨不成... 先夫死不得... 至反實繼室以聲子生隱公

則同姓之國以姪媵元妃死則諸... 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

反又丈一反兄弟也

子造前解... 宋武公生仲子

盡十一年

執舍經以... 延等還誦



北京大學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普通高等教育“十五”国家级规划教材

# 中国古文献学

孙钦善 撰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文献学/孙钦善撰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6.5

ISBN 7-301-06627-9

I. 中… II. 孙… III. 古文献学—中国—高等学校—教材 IV. G25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3832 号

书 名: 中国古文献学

著作责任者: 孙钦善 撰

责任编辑: 张弘泓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6627-9/G·0907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 [pl@pup.pku.edu.cn](mailto:pl@pup.pku.edu.cn)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34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30mm × 980mm 16 开本 26.75 印张 600 千字

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8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 [fd@pup.pku.edu.cn](mailto:fd@pup.pku.edu.cn)

# 目 录

<b>第一章 绪论</b> .....	(1)
第一节 中国古文献综述.....	(1)
第二节 古文献学的内涵和意义 .....	(20)
<b>第二章 目录</b> .....	(28)
第一节 目录名称的由来、演变和目录的体制 .....	(28)
第二节 中国古文献目录的特点和优良传统 .....	(30)
第三节 目录的功用 .....	(40)
第四节 古文献群书目录的种类 .....	(42)
第五节 古文献目录的传承源流和准确利用 .....	(46)
<b>第三章 版本</b> .....	(63)
第一节 版本与版本学 .....	(63)
第二节 纸书的装帧形式 .....	(66)
第三节 纸书版本的类别 .....	(73)
第四节 版本的鉴定 .....	(92)
第五节 版本源流系统的考证.....	(107)
<b>第四章 校勘</b> .....	(116)
第一节 校勘与校勘学.....	(116)
第二节 古文献错乱的情况和原因 .....	(118)
第三节 校勘的基本方法和方式.....	(121)
第四节 校勘的历史成果和经验.....	(127)
第五节 校勘应注意的几个问题.....	(150)
<b>第五章 辨伪</b> .....	(155)
第一节 辨伪学的内涵、意义及伪书产生的复杂原因和情况 .....	(155)
第二节 辨伪的基本方法 .....	(157)
第三节 辨伪的历史成果和经验.....	(162)
第四节 现当代辨伪概述.....	(184)
第五节 辨伪应注意的几个问题.....	(196)

<b>第六章 辑佚</b> .....	(198)
第一节 辑佚与辑佚学 .....	(198)
第二节 古书散佚的情况、原因和辑佚的意义 .....	(200)
第三节 辑佚的基本方法 .....	(202)
第四节 辑佚的历史概述 .....	(207)
第五节 辑佚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.....	(239)
<b>第七章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(上)——总说·文字</b> .....	(244)
第一节 语文解读在古文献学中的基础地位及所涉及的有关问题 .....	(244)
第二节 文字 .....	(247)
<b>第八章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(中)——音韵</b> .....	(260)
第一节 语音学常识 .....	(261)
第二节 现代汉语语音系统 .....	(266)
第三节 古代的注音法和反切 .....	(270)
第四节 古代的韵书和韵部 .....	(274)
第五节 古代的字母和声母系统 .....	(284)
第六节 等韵 .....	(286)
第七节 上古音 .....	(298)
<b>第九章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(下)——训诂</b> .....	(307)
第一节 “训诂”释义和训诂学的定义 .....	(307)
第二节 训诂的基本方法 .....	(308)
第三节 训诂史略及有关成果 .....	(323)
第四节 正确进行训诂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.....	(341)
<b>第十章 古文献的内容考实</b> .....	(350)
第一节 古文献内容考实的范围和意义 .....	(350)
第二节 中国古代关于古文献内容考实的经验和成果 .....	(352)
第三节 近代以来关于古文献内容考实的经验和成果 .....	(382)
第四节 古文献内容考实的主要方法和应注意的问题 .....	(390)
<b>第十一章 古文献的义理辨析</b> .....	(397)
第一节 义理与义理学 .....	(397)
第二节 义理学的历史概述 .....	(400)
第三节 辨析义理的正确方法 .....	(415)
<b>后 记</b> .....	(422)

# 第一章 绪论

## 第一节 中国古文献综述

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,有着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。在这丰富的古代文化遗产宝库中,汉语文献典籍一直流传不断,占据着重要地位。一般所称的中国古文献,实际指汉语古文献,本书亦沿其称。在汉语里“文献”一词起源很早,《论语·八佾》:“子曰:‘夏礼吾能言之,杞不足徵也;殷礼吾能言之,宋不足徵也。文献不足故也,足则吾能徵之矣。’”当时所谓的文献,文指文字材料,献谓宿贤,指保存在知识丰富的长老那里的口头传说材料。到后来,“文献”成为一个词,专指由文字记录的书面材料,我们所用的“文献”一词的内涵,就是这个意思。古文献的基本类型有两种,一是传世古文献,一是出土古文献。

### 一 传世古文献

传世古文献指成文后一直不断流传的文献,构成我国古文献的主体。此类文献产生以后,在流传、整理过程中,不断发生变异。变异主要表现在形式方面,就语言文字而言,语言是相对稳定的,即基本保持文献写成时的语言,但也有据后代语改前代语的少数情况,文字是变化的,即随着文字形体的变化而在传抄、传刻时改变;就文本形态而言,外在形态与内在形态都是不断变化的因素,外在形态的变化如经历了竹书或帛书、纸书、写本、印本、电子版本等等,内在形态的变化如由单篇流传到编纂成书,成书后又会产生署名、标题、篇、卷、编次、名称、序文位置等体例的变异,即所谓变乱旧式。内容的变异则表现为窜改、歪曲、增益、删略和伪造等,但与形式的变异相比要小得多。对于传世文献,特别是传世的先秦、秦汉文献,必须有这样一个动态的、变异的历史观念,否则在许多问题上如校勘、辨伪等,都会产生混乱,出现种种“以今类古”的弊端。前人早已在这方面有所总结,如余嘉锡的《古书通例》一书就谈得相当全面、系统。《古书通例》书末说:

凡读古人之书,当通知当时之文体。俞樾曰:“周、秦、两汉至于今远矣,执今

人寻行数墨之文法，而以读周、秦、两汉之书，譬犹执山野之夫，而与言甘泉、建章之巨丽也。”（《古书疑义举例序》）。斯言信矣。然俞氏之所斤斤者，文字句读之间耳。余则谓当先明古人著作之本，然后可以读古书。古人作文，既不自署姓名，又不以后人之词杂入前人著述以为嫌，故乍观之似无所分别。且其时文体不备，无所谓书序、题跋、行状、语录。复因竹简繁重，撰述不多，后师所作，即附先师以行，不似后世人人有集，弊帚自享，以为千金，惟恐人之盗句也。故凡其生平公牍之文，弟子记录之稿，皆聚而编之。亦以其宗旨一贯，自成一家之学故也。夫古书之伪作者多矣，当别为专篇以明之。若因其非一人之笔，而遂指全书为伪作，则不知古人言公之旨。譬之习于豪强兼并之俗，而议三代之井田也。

余嘉锡此书分《案著录第一》、《明体例第二》、《论编次第三》、《辨附益第四》四卷，其中涉及古书体例的有：“周秦古书，皆不题撰人。俗本有题者，盖后人所妄增”、“古书之命名，多后人所追题”、“古书多无大题，后人乃以人名其书”、“今所传古书之名，有为汉以后人所题，故与《汉志》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参差不合，如老子《道德经》是也”、“先秦诸子即后世之文集”、“周、秦及西汉初年诸子，或自著、或追记、或自著与追记相杂糅，其体例至为不一”等等。

张舜徽《广校雠略》亦对古书体例有所考论，如“古人著述皆书成之后始有大题”、“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之名皆后人补题”、“一书而数易大题者宜详其变革”、“经传篇题多经后人增损（论曰：古书题篇，大抵小题在上，大题在下。）”卢文弨《钟山札记》、钱大昕《养新录》考证精核，已成定论。顾小课题多不出一手，随时增新，乃有累至数十字者。《毛诗》卷首标题云：“《周南关雎训诂传第一》，《毛诗国风》，郑氏笺。”《正义》曰：“自周南至郑氏笺凡十六字，所题非一时也。‘周南关雎’至‘第一’‘诗国风’，元是大师所题之。‘毛’一字，献王加之。‘郑氏笺’，郑自题之。”舜徽案：经传之传于今，凡几变矣，自传注附于经，而古书面目一变；自义疏附于经注，而古书面目再变。故在今日考论经传之例，盖有古书原本之标题，有汉人传注家之标题，有唐人义疏家之标题，有宋人合刻注疏之标题，学者不可不辨也。《毛诗》卷首所题十六字，此汉世通行本之标题也，魏、晋以来，靡不同之。唐人作《正义》时，犹未变其旧目。其他经传标题，经唐、宋人情性改易者则有矣。《公羊传》卷首标题云“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隐公第一》”，徐彦疏曰：“案旧题云‘《春秋隐公经传解诂第一》公羊、何氏’，今定本则升‘公羊’字在‘经传’上，退‘隐公’字在‘解诂’字之下，未知自谁始也？”据此，可知今注疏本之标题乃唐人定本所移易改定者，而非何氏撰解诂时之旧也。《周易正义》卷首标题云“《周易兼义上经乾传第一》”，阮氏校勘记曰：“‘兼义’字乃合刻注疏者所加，取兼并《正义》之意也。盖其始注疏无合一之本，南北宋之间以疏附于经注者，谓之某经兼义，至其后则直谓之某经注疏，此变易之渐也。”据此，可知今本《周易正义》之标题乃宋人所增益更

定者，而并非唐人撰定义疏时之旧也。后出日新，离真益远，学者当审知之。”“古书分章别题皆后人所加”等等。了解古文献在流传当中产生的种种变异情况，对于正确认识传世的古文献很有必要。

传世古文献在传统目录分类上最后确定为经史子集四部，下面分别简要介绍一下这四类书成书、流传等有关情况。

经书成书最早，在流传中的附益之作也最多。相传六经经过孔子整理，其实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深浅各不相同，应分别论之：

《周易》是一部占筮书，原只称《易》，自汉代起被奉为儒家经典。今传《周易》，包括本经和易传，本经即六十四卦卦象及卦、爻辞，易传指《彖》（分上下）、《象》（分上下）、《系辞》（分上下）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，即所谓“七种十翼”。关于孔子与《周易》的关系，传统有几种说法：第一，孔子作易传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，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认为伏羲“始作八卦”，周文王“重《易》六爻，作上下篇”（即重八卦为六十四卦，每卦六爻，并作卦辞、爻辞），“孔氏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。故曰：《易》道深矣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”。

第二，孔子不但作易传，亦作卦辞、爻辞，见皮锡瑞《经学通论·易经·论卦辞文王作爻辞周公作皆无明据当为孔子所作》。又《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象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》一节，更论易传亦孔子所作。此说很少有人附和。

第三，从宋代开始，不断有人怀疑易传亦非孔子所作。欧阳修作《易童子问》，始辨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卦》而下，皆非圣人（孔子）之作，但不怀疑《彖》、《象》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云：赵汝谈《南塘易说》三卷，“专辨十翼非夫子作”，今此书无传。清代姚际恒、崔述等学者皆主此说。

经过近现代一些学者的进一步考证，可以肯定易经、易传皆非孔子所作（参见李镜池《周易探源》）。卦辞、爻辞为古代卜史之官所掌管的原始筮辞，经后人编纂而成。易传七种十篇，作非一人，成非一时，包括了战国后期至秦汉间学者对《易经》的解释，其中得《易经》本义者绝少，引申发挥者居多。反映的思想亦较复杂，出于儒家的为主（如《彖》、《象》），亦涉他家。易传如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中虽多“子曰”字样，或为后儒假托于孔子，或如欧阳修所说：“至于‘何谓’‘子曰’者，讲师之言也。”（《易童子问》卷三）

关于孔子与《周易》的关系，应从有关孔子生平思想最可靠的材料《论语》中去探求。《论语》直接涉及《周易》的材料仅有两章，一章是：

子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（《述而》）

这一章正可与他自己的另一句话：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（《为政》）互相印证，说明孔子晚年



学过《周易》。

另一章是：

子曰：“南人有言曰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’善夫！”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”子曰：“不占而已矣。”（《子路》）。

其中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”，系《周易·恒》九三爻辞，孔子引用此语，与“南人”之言类比，并作了说解：“不占而已矣。”这说明孔子确实对弟子讲过《周易》，故此条被弟子记录下来，见载于《论语》。但是《论语·公冶长》又载：“子贡曰：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也；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而闻也。”由此可知，连孔子较亲密的弟子、“十哲”之中的子贡都未听到孔子讲“天道”。这又说明，孔子即使讲论关涉“天道”的《周易》，也只是偶尔所及，并未把它作为教学的内容。这并不是因为孔子不信天道，只是因为天道幽深难明，不便言说罢了。因此，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谓孔子传《易》商瞿（字子木），八传至杨何，值得怀疑。

《尚书》是我国上古誓、诰、命、谟等记言的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，原只称《书》，又称《书经》。现在通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本《尚书》，实际上是可靠的《今文尚书》（亦杂有《古文尚书》篇什，如《金縢》）和伪《古文尚书》的合编。《今文尚书》西汉初存二十八篇，在与伪《古文尚书》合编时被分割为三十三篇（今《十三经注疏》本所存即是），即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（由《尧典》分出，首加二十八字）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（由《皋陶谟》分出，以上属《虞书》）、《禹贡》、《甘誓》（以上二篇属《夏书》）、《汤誓》、《盘庚》上中下（由一篇分为三篇）、《高宗彤日》、《西伯戡黎》（以上六篇属《商书》）、《微子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洪范》、《金縢》（此篇实属古文尚书，与《尚书大传》所言有别）、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无逸》、《君奭》、《多方》、《立政》、《顾命》、《康王之诰》（由《顾命》分出）、《吕刑》、《文侯之命》、《费誓》、《秦誓》（以上二十一篇属《周书》）。伪《古文尚书》共二十五篇，即《大禹谟》、《五子之歌》、《胤征》、《仲虺之诰》、《汤诰》、《伊训》、《太甲》上中下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说命》上中下、《泰誓》上中下、《武成》、《旅獒》、《微子之命》、《蔡仲之命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、《君牙》、《冏命》（亦存于今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）。伪《古文尚书》，包括现传全部孔安国传，自宋至清经过不少学者的怀疑、考订，可以肯定是魏晋间人（王肃或王肃之徒）伪造。《今文尚书》二十八篇乃是传自古代的不完全的《尚书》遗篇，因为是用汉代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录的，故称“今文”。《今文尚书》中又分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、《商书》、《周书》四部分。《虞书》、《夏书》中的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禹贡》，是战国时人根据古代所传的资料及传说加工编造而成的，其中的《甘誓》可能是夏代原有的训辞，口耳相传，经过商、周辗转写定的。《商书》中的几篇以商代史官记录的原件作基础，在流传中经过语言文字的译释

加工,最后由周代人写定的。至于《周书》部分,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,个别篇章如《洪范》可能是战国时人编造而成并加进去的。

关于孔子与《尚书》的关系,传统有所谓“序《尚书》”之说。《史记·三代世表序》及《孔子世家》所说的“序”即编次之义。至班固(袭刘向、刘歆之说),不仅认为孔子整理、编次过《尚书》,并且还认为孔子为《尚书》作过序,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及《儒林传》。孔子是否真作过《书序》,尚值得怀疑。而今传《尚书》中的《大序》、《小序》皆为后人伪作,这是经过宋代洪迈(见《容斋四笔》)、朱熹(见《朱子语类》卷七十八)、清代顾炎武(见《日知录》卷二)等学者的怀疑、考证而终成定论的。

根据《论语·述而》“子所雅言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礼皆雅言也”,《尚书》在孔子之前已经成书。又《为政》有一章:

或谓孔子曰:“子奚不为政?”子曰:“《书》云:‘孝乎惟孝,友于兄弟,施于有政。’是亦为政,奚其为为政?”

这里孔子引《尚书》回答问题。其文不见今传《今文尚书》,当为《尚书》佚文,而被伪《古文尚书》采入《君陈》。可知孔子当时所见的《尚书》,篇数多于今传《今文尚书》。还有一章见于《宪问》:

子张曰:“《书》云‘高宗谅阴,三年不言’,何谓也?”子曰:“何必高宗,古之人皆然。君薨,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。”

这里记载孔子给弟子解释《尚书》的情况。子张引文见于今传《尚书·无逸》,文字及详略有异,当为概引。

由此可证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所说“孔子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礼、乐教弟子”的话是可信的。至于是否系统整理过《尚书》,尚在疑然之间。

《诗经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原只称《诗》,存三百零五篇,另有六篇有目无诗,旧称六笙诗。《诗经》分为“风”、“雅”、“颂”三大类。《风》有十五国风,共一百六十篇,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期的作品。其中不少是民歌,其来源与古代“采诗”制度有关,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“……故古有采诗之官,王者所以观风俗,知得失,自考正也。”《雅》分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。《大雅》三十一篇,多是西周王室贵族的作品;《小雅》七十四篇,大抵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,多为一般贵族士人的作品。《颂》分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。《周颂》三十一篇,多是西周统治者用于祭祀的庙堂乐歌;《鲁颂》四篇,为鲁国贵族歌颂其统治者鲁僖公的作品;《商颂》五篇,为周宣王时(当宋戴公之时)宋国大夫正考父整理周太师所保存的商之后人追颂先王、先祖的乐歌而成。

关于孔子与《诗经》的关系,传统有“删诗”之说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:“古者诗三千余篇,及至孔子,去其重,取可施于礼义,上采契、后稷,中述殷周之盛,至幽厉之缺。……三百五篇,孔子皆弦歌之,以求合《韶》、《武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音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虽未明言孔子由三千余篇删成三百零五篇,但亦言由孔子选定三百零五篇。至东汉郑玄,不取“删诗”之说,而持孔子“补录”之说。其《诗谱序》认为自成王、周公以前盛时风雅之诗,“谓之诗之正经”;“后王稍更陵迟……故孔子录懿王、夷王时诗,乞于陈灵公淫乱之事,谓之变风变雅”。宋代的叶适明确驳“删诗”之说,其《习学记言序目》卷六说:“《史记》:古《诗》三千余篇,孔子取三百五篇;孔安国亦言‘删诗为三百篇’。按《诗》,周及诸侯用为乐章,今载于《左氏》者,皆史官先所采定,就有逸诗,殊少矣,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。又《论语》称‘《诗》三百’,本谓古人已具之《诗》,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。”此说言之成理,多为后代学者所附和,见于王士禛的《池北偶谈》,朱彝尊的《经义考》,江永的《乡党图考》,崔述的《洙泗考信录》、《读风偶识》、《丰镐考信录》,魏源的《诗古微》等。除举《论语·为政》称“《诗》三百”,《子路》称“诵《诗》三百”及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引《诗》范围以为例证之外,有人还补充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吴公子季札聘鲁观周乐为例,指出季札听到乐工所歌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的内容,除十五国风顺序与今传《诗经》有异外,看不出在数量上明显超出今传《诗经》的地方,说明在襄公二十九年正值孔子八岁之时,《诗经》已具“诗三百”的规模。通过这些论证,可以断定所谓孔子“删诗”之说是不可信的。

在《论语》中,孔子谈及《诗经》的地方很多,大致可分几种情况:有关于评论的,有关于诗教的,有关于解释的。孔子对《诗经》的评论和解释,有一个鲜明的标准和目的,就是服务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和道德,这并不完全是孔子的独创,它与当时《诗经》在贵族社会的运用情况基本相符。这一点在《诗经》的流传中产生巨大影响,后儒的各家诗说多源于此。

礼包括敬鬼神、区别长幼尊卑的各种规定和仪节形式,主要是古代贵族等级制度的反映,其中也有一些氏族制无阶级社会礼俗的遗存。孔子主张礼治,十分重视礼。

孔子曾说:“夏礼,吾能言之,杞不足徵也;殷礼,吾能言之,宋不足徵也。文献不足故也,足则吾能徵之矣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可见孔子之时,夏礼、殷礼仅存传说,已无文献可徵。至于周礼,自从周公整理过以后,就有文献流传。《左传·文公十八年》载大夫克的话说:“先君周公制《周礼》曰:‘则以观德,德以处事,事以度功,功以食民。’”可知《周礼》(非今传《周礼》)在春秋时已经成书流传。又《左传·哀公三年》有“子服景伯至,命宰人出礼书,以待命”的话,也是当时礼制已成书的证明。周礼到春秋之时,虽开始遭到破坏,但现实生活中还在流行,并且记载其制的书还相当完备,所以孔子说:“周监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!吾从周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

执礼是儒者的重要职务,身为儒者、并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,素以好礼、知礼闻名。孔子把礼列为教育的重要内容,强调“克己复礼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、“不学礼,无以立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。他的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曾说:“夫子循循然善诱人,博我以文,约我以礼。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《孔子世家》还记载:“孔子去曹适宋,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之下。”《论语·八佾》、《论语·乡党》等于言礼的专篇。涉及礼的方面也比较广泛,《礼记·昏义》:“夫礼始于冠,本于昏,重于丧、祭,尊于朝、聘,和于射、乡,此礼之大体也。”这里所说的冠、昏、丧、祭、朝、聘、射、乡(乡饮酒礼)等礼的八大纲目的内容,在《论语》中几乎都可以找到。又《左传·哀公二十一年》载齐人歌中有“唯其(指鲁)儒书,以为二国(指齐、鲁)忧”句,儒书即指礼书。孔子及其门徒为鲁国儒者的代表,当时距孔子卒仅五年,鲁国的礼书已有儒书之称,亦可证孔子传授并整理过礼书。周代礼制、礼书的流传,与孔子及其门徒后学关系十分密切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:孔子死后,“而诸儒亦讲习乡饮大射于孔子冢”,并在“太史公曰”中自称:“余读孔氏书,想见其为人。适鲁,观仲尼庙堂,车服礼器,诸生以时习礼其家,余祇回留之,不能去云。”

现在流传的“三礼”,其成书皆直接或间接与孔子有关。

《仪礼》为记载礼节仪式之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:“礼古经五十六卷,经十七篇(原作七十篇,据刘敞说改)。”因只存十七篇,仅限于士礼,故有《士礼》之称,旧说认为是秦始皇焚书后的残余。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说:“礼固自孔子时,而其经不具。及至秦焚书,散亡益多,于今独有《士礼》,高堂生能言之。”这里说《仪礼》传自孔子。至唐,孔颖达《礼记正义序》、贾公彦《仪礼疏序》认为周公所作,后人多疑其非。清崔述在《丰镐考信录》中曾辨《仪礼》非周公所作,其言甚详,并据《礼记·杂记下》所云“恤由之丧,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《士丧礼》,《士丧礼》于是乎书”,认为“《士丧礼》之文昉于孔子”。至邵懿辰《礼经通论》则明确认为:“《礼》十七篇盖孔子所定。《檀弓》(按,当为《杂记》)云:‘恤由之丧,哀公使孺悲学《士丧礼》于孔子,《士丧礼》于是乎书。’据此,则《士丧》出于孔子,其余篇亦出于孔子可知。汉以十七篇立学,尊为《经》,以其为孔子所定也。”皮锡瑞《三礼通论》完全同意此见,认为“邵氏之说犁然有当于人心”。这种说法不无根据。陈公柔《士丧礼、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》一文(载《考古学报》1956年4期)把《仪礼》的《士丧礼》、《既夕礼》所记的随葬器物的组合形式,跟考古发现墓葬中的实际情况对比,认为《仪礼》反映的大约是战国初期的情况,而战国初期离孔子生世甚近,礼制不会发生多大变化。

《礼记》是后儒汇集而成的孔子及其后学传述礼制、论说礼义的著作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“《记》百三十一篇”,自注:“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。”《经典释文·叙录》云:“《礼记》者,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,后人通儒各有损益。故《中庸》是子思伋所作,《缙衣》是公孙尼子所制(按:郭店竹简中亦有《缙衣》,学者认为亦为子思所作),郑玄云:《月令》是吕不韦所撰,卢植云:《王制》是汉时博士所为。”这些关于礼的传述

和论说,在先秦多以单篇散章的形式流传,约在西汉前期被汇集、补撰成书。今传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礼记》即为其中的一部分篇什,称小戴《礼记》。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于“礼记”题下引郑玄《六艺论》云:“案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儒林传》云:传礼者十三家,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、戴圣名在也”,“今《礼》行于世者,戴德、戴圣之学也”,“戴德传《记》八十五篇,则《大戴礼》是也;戴圣传《礼》四十九篇,则此《礼记》是也”。

今传小戴《礼记》四十九篇,大致可分为三类:一类述礼制,一类陈礼说,一类解经(《仪礼》)义,与孔子所定的《仪礼》以及孔子关于礼的言行关系密切。

《礼记》和《仪礼》的关系有以下几点:第一,《礼记》在内容上比《仪礼》的范围有所扩充,不限于仪节形式,还包括政教、礼俗,属广义的礼。如《王制》、《月令》、《学记》、《乐记》、《坊记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儒行》、《大学》等篇已超出《仪礼》内容之外。第二,《礼记》中解经义的一些篇什等于《仪礼》的传。如《经解》,孔颖达《正义》于题下引郑玄《礼记目录》云:“名曰《经解》者,以其记六艺政教之得失也。”其实《经解》并不限于泛论六艺与政教的关系,而着重在谈礼与政的关系,解释礼的纲目,如:“故朝觐之礼,所以明君臣之义也;聘问之礼,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;丧祭之礼,所以明臣子之思也;乡饮酒之礼,所以明长幼之序也;昏姻之礼,所以明男女之别也。”实际等于《仪礼》的总序。至于《冠义》、《昏义》、《乡饮酒义》、《射义》、《燕义》、《聘义》诸篇,则相当于《仪礼》每篇的小序,故郑玄《礼记目录》说:“《仪礼》有其事,此记释其义”(《乡饮酒义》题下《正义》引)，“以上诸篇(指《冠义》等六篇)皆记《仪礼》当篇之义,故每篇言义也”(《丧服四制》题下《正义》引)。又《服问》篇中例标“传曰”字样,与《仪礼》的《丧服大传》相似。第三,《礼记》中还记载了一些在实际生活中践履礼仪的言和事,亦与《仪礼》相表里。第四,戴德、戴圣本从后仓受《仪礼》,而自传大、小戴《礼记》,可证《礼记》为《仪礼》之附庸。

《礼记》中记载了不少孔子的言行,也有一些他的几个主要弟子的言行。关于孔子的言行,须具体分析,有的直述《论语》,有的稍变其词,有的将具体言行改为礼之通则,有的为其弟子所记,而《论语》未收,这些方面都是有本之言,是可靠的。但多数情况确如何异孙《十一经问答》所说:“多非孔子之言,凡‘子曰’者多假托。”涉及其弟子言行者也是如此。

以上情况可以说明,《礼记》为儒家之书,出自孔门后学之手。

《周礼》本名《周官》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周官经》六篇,颜师古注曰:“即今之《周官礼》也,亡其冬官,以《考工记》充之。”《周礼》序官辨职,涉及田制、兵制、学制、礼仪、刑法等方面的大政,包含着丰富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资料,实际上是一部政书。《考工记》虽为后人所补,无关大政,但也是先秦古书,是考证古代工艺、器物的重要资料。

《周礼》一书,或谓反映周公致太平之书(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),或径谓周公所作(《周礼》郑玄注),此二说汉时已有人反对,唐贾公彦《周礼疏·序周礼废兴》载有异说:

《周礼》起于成帝刘歆，而成于郑玄，附离之者大半，故林孝存（《后汉书·郑玄传》作“临孝存”，名硕）以为武帝知《周官》末世湮乱不验之书，故作十论七难以排斥之。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。

又有为刘歆所伪造之说，始于宋洪迈《容斋续笔》：

《周礼》一书，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。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，考其实，盖出于刘歆之手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尽载诸经专门师授，此独无传。至王莽时歆为国师，始建立《周官经》以为《周礼》，且置博士。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，还家以教门徒。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，此书遂行。

此说后世遵违不一，至清廖平《今古学考》、康有为《新学伪经考》认定不疑，实为今文学派门户之见。经过古今不少学者的考证，《周礼》成书于战国时代有历史依据，绝非凭空臆造，但不限于反映西周一代的现实，而是综合了西周至战国的情况，并且包括编纂者理想化的成分在内，正如张心澂《伪书通考》所说：“采西周及春秋时制度参以己意而成。”《周礼》体现了礼治的思想，表现出对周制的向往，其中也经常提到“法”，但是指“法则”或“方法”，与法家之法无关。因此《周礼》出自儒家无疑，但与孔子的关系较为疏远。

乐是与礼相配为用的，“乐也者，动于内者也；礼也者，动于外者也”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，所以礼乐并称。因为《诗经》中的诗都是入乐的，所以诗与乐又不可分。孔子说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说明诗、礼、乐三者关系极为密切。孔子既传诗、传礼，对乐也就很精通，《论语》中评论到乐的地方很多。

孔子还亲自整理过乐典，如《论语》载：“子曰：‘吾自卫返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’”（《子罕》）

《春秋》本是春秋时鲁国史官按年月记载的大事记，等于鲁国的编年史，从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至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，历十二公，共二百四十二年。

论及孔子与《春秋》的关系，最早见于《孟子》，有两处谈到，一处是：

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故孔子曰：“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”……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（《滕文公下》）

这里说孔子“作《春秋》”、“成《春秋》”，是有其特定含义的。在另一处又说：

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梲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一也；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。孔子曰：“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”（《离娄下》）

由此可知，《春秋》与晋国的史书《乘》、楚国的史书《梲杌》性质相同，为鲁国的史书，孔子只是取其义而已。综合《孟子》书中的这两段话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：第一，《春秋》本是鲁国的史书，孔子依傍鲁史而作《春秋》，并不是创作，只是整理、修订；第二，孔子整理《春秋》时曾取其义以行褒贬，因此从《春秋》叙事中可以看出孔子的立场与爱憎，这就是传统所说的“微言大义”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本《孟子》之说而又有所阐发、补充：

（孔子）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，上至隐公，下讫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。据鲁，亲周，故殷，运之三代，约其文辞而指博。故吴楚之君自称王，而《春秋》贬之曰子；践土之会，实召周天子，而《春秋》讳之曰：“天王狩于河阳。”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。后有王者，举而开之，《春秋》之义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。孔子在位听讼，文辞有可与人共者，弗独有焉；至于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

孔子整理《春秋》的说法虽不见于《论语》，但《论语》所表现的孔子的立场、观点，与《春秋》记事中的褒贬、爱憎完全是合辙的。因此，孟子和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信的。

在先秦，荀况在经书的流传上亦起过相当大的作用。《荀子》书中引证《诗经》的情况非常普遍。其中《礼论》、《乐论》等于礼乐的专篇，散见的礼乐之说亦复不少。刘向《荀子叙录》说：“孙卿善为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。”清人汪中有一篇《荀卿子通论》（见《述学·补遗》），专考荀况传授诸经之事，颇有参考价值，兹逐录如下：

荀卿之学出于孔氏，而尤有功于诸经。《经典叙录·毛诗》：“徐整云：子夏授高行子，高行子授薛仓子，薛仓子授帛妙子，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。毛公为《诗故训传》于家，以授赵人小毛公。一云：子夏传曾申，申传魏人李克，克传鲁人孟仲子，孟仲子传根牟子，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，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。”由是言之，《毛诗》，荀卿子之传也。《汉书·楚元王交传》：“少时尝与鲁穆生、白生、申公同受《诗》于浮邱伯。伯者，孙卿门人也。”《盐铁论》云：“包邱子与李斯俱事荀卿（汪氏自注：包邱子即浮邱伯）。”刘向叙（指《荀子叙录》）云：“浮邱伯受业为名儒。”《汉

书·儒林传》：“申公，鲁人也，少与楚元王交俱事齐人浮邱伯，受《诗》。”又云：“申公卒，以《诗》、《春秋》授，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。”由是言之，《鲁诗》，荀卿子之传也。《韩诗》之存者，《外传》而已，其引荀卿子以说诗者四十有四，由是言之，《韩诗》，荀卿子之别子也。《经典叙录》云：“左丘明作《传》以授曾申，申传卫人吴起，起传其子期，期传楚人铎椒，椒传赵人虞卿，卿传同郡荀卿，名况，况传武威（汪氏自注：武威，据《史记·张丞相传》当作阳武）张苍，苍传洛阳贾谊。”由是言之，《左氏春秋》，荀卿子之传也。《儒林传》云：“瑕丘江公受《穀梁春秋》及《诗》于鲁申公，传子至孙为博士。”由是言之，《穀梁春秋》，荀卿子之传也。荀卿所学，本长于《礼》。《儒林传》云：“东海兰陵孟卿善为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授后苍、疏广。”刘向叙云：“兰陵多善为学，盖以荀卿也，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。喜字为卿（按，《释文·礼经序录》注谓孟卿为孟喜之父，盖以法荀卿。”）又二戴《礼》并传之孟卿，大戴《曾子立事》篇载《修身》、《大略》二篇文，小戴《乐记》、《三年问》、《乡饮酒义》篇载《礼论》、《乐论》篇文，由是言之，曲台之礼，荀卿之支与余裔也。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歿，汉诸儒未兴，中更战国、暴秦之乱，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，荀卿也。周公作之，孔子述之，荀卿子传之，其揆一也。故其说“霜降逆女”与毛传同义。《礼论》、《大略》二篇，《穀梁》义具在。又《解蔽篇》说《卷耳》，《儒效篇》说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，《大略篇》说《鱼丽》、“国风好色”，并先师之逸典。又《大略篇》：《春秋》贤穆公善胥命，则为《公羊春秋》之学。楚元王交本学于浮邱伯，故刘向传《鲁诗》、《穀梁春秋》，刘歆治《毛诗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董仲舒治《公羊春秋》，故作书美荀卿，其学皆有所本。刘向又称荀卿善为《易》，其义亦见《非相》、《大略》二篇。盖荀卿于诸经无不通，而古籍阙亡，其授受不可尽知矣。

《史记》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，于荀卿则未详焉。今考其书，始于《劝学》，终于《尧问》（自注：刘向所编，《尧问》第三十，其下仍有《君子》、《赋》二篇。然《尧问》末附荀卿弟子之词，则为末篇无疑。当以杨倞改订为是），篇次实仿《论语》。《六艺论》云：“《论语》，子夏、仲弓合撰。”《风俗通》云：“穀梁为子夏门人。”而《非相》、《非十二子》、《儒效》三篇每以仲尼、子弓并称。子弓之为仲弓，犹子路之为季路，知荀卿之学实出于子夏、仲弓也。《宥坐》、《子道》、《法行》、《哀公》、《尧问》五篇，杂记孔子及诸弟子言行，盖据其平日之闻于师友者，亦由渊源所渐、传习有素而然也。故曰荀卿之学出于孔氏，而尤有功于诸经。

经书流传到汉代出现今古文学派，师承、文字、文本、解说各异，具体传授情况，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、《汉书·儒林传》、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等记载。《汉书·艺文志·六艺略》（本刘歆《七略》）包括九类书：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小学，为刘向亲自整理。经书在流传中附益之作最多，有注，有



疏。现传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注，大半出自汉代，如《诗经》的毛传、郑笺，三礼的郑玄注，《公羊传》的何休注，《孟子》的赵岐注。

汉代与经书有关的还有纬书，纬与经相对而言，其特点是以讖说经，以经证讖，即假托经文经义，附会人事吉凶祸福，预言帝业治乱兴废。正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说：“言五经者，皆凭讖为说。”因此可以说，纬学就是方士的经学，是被方术神化了的经学。史称纬书，有广狭二义。广义包括图讖纬候几类书在内，狭义则专指七纬（即《七经纬》）。

《七经纬》的细目，最早见于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·樊英传》李贤注：

七纬者，《易》纬《稽览图》、《乾凿度》、《坤灵图》、《通卦验》、《是类谋》、《辨终备》也；《书》纬《璇玑钤》、《考灵曜》、《刑德放》、《帝命验》、《运期授》也；《诗》纬《推度灾》、《汜历枢》、《含神务》也；《礼》纬《含文嘉》、《稽命徵》、《斗威仪》也；《乐》纬《动声仪》、《稽耀嘉》、《汁图徵》也；《孝经》纬《援神契》、《钩命决》也；《春秋》纬《演孔图》、《元命包》、《文耀钩》、《运斗枢》、《感精符》、《合诚图》、《考异邮》、《保乾图》、《汉含孳》、《佑助期》、《握诚图》、《潜潭巴》、《说题辞》也。

总计三十五种。

纬书不仅内容虚妄，而且托古作伪，于此汉时即有所辨驳。东汉章帝时，王充辨讖纬之书，《论衡》中多见。

关于纬书的禁废、散佚，《隋书·经籍志·讖纬序》说：“至宋（刘宋）大明中，始禁图讖，梁天监已后，又重其制。及高祖（隋文帝）受禅，禁之逾切。炀帝即位，乃发使四出，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，皆焚之，为吏所纠者至死。自是无复其学，秘府之内，亦多散亡。”今传纬书，皆为辑佚之作，主要有明孙穀《古微书》、清黄奭《通纬》五十六种（见《汉学堂丛书》及《黄氏逸书考》）、赵在翰《七纬》、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（纬书类四十种）等。

纬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，在思想上有研究价值。从文献学上看，其对经书的解说纯属穿凿、附会，这一基本倾向无疑应该否定。但是纬书的作者多通天文历法，纬书中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，对于考释文献有参考价值。关于训诂、名物也有不少说法可取，如“社为土神，稷为谷神”的正确解释，即出自《孝经援神契》。

经书流传到魏晋，又出现一些注释之作。流传下来的，如《十三经注疏》中《周易》的王弼注、《春秋左传》的杜预集解、《春秋穀梁传》的范宁集解、《论语》的何晏集解等，形成与汉注平分秋色的局面。但也出现伪书，如《十三经注疏》中的《伪古文尚书》二十五篇及伪孔安国传。

经书到南北朝出现音义之作和义疏之作。完整流传下来的义疏之作有皇侃（梁